

新时代西北地区转型跨越的区域方位

王海燕¹ 刘玉顺² 闫磊³

(1.甘肃行政学院 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兰州 730010 2.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兰州 730070;
3.兰州理工大学 经管学院,兰州 730050)

【摘要】特殊的资源禀赋、区位环境和经济结构,诱致了西北地区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新时代西北地区的转型跨越需要紧盯历史赋予的区域方位,承接时代给予的发展方略,基于区域方位的历史传承性,瞄准丝绸之路经济带,发掘区域新的空间价值,有助于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基于区域方位的资源黏联性,瞄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构价值链治理路径,有助于变资源诅咒为资源福音;基于区域方位的环境差异性,瞄准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强化中小企业创新支持,有助于为转型跨越提供不竭动力;基于区域方位的制度连续性,瞄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助于提高农民发展能力;基于区域方位的空间有界性,瞄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绿色发展,有助于西北生态脆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战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C911.1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7)05-0108-06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赓续着改革的初心,牢记使命,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面临当前中国发展中的一系列突出矛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解决了新常态下,生态经济、国企改革、扶贫攻坚、创新创业、简政放权等诸多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前进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十九大之后,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我们相信,中华民族一定会日益“强起来”,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毫无疑问,新时代和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承担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责任。环视西北地区的发展,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3,因

其特殊的资源禀赋、区位环境和经济结构诱致了西北地区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决定了它必是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典型区域。

一、基于区域方位的历史传承性,瞄准丝绸之路经济带,发掘新的空间价值

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

收稿日期:2017-10-30

作者简介:王海燕,女,甘肃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刘玉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闫磊,男,博士,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甘肃行政学院“基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西北地区经济转型跨越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精准扶贫机制研究”(YB082)、“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研究”(YB159)、“甘肃省推进工业化进程研究”(YB079);甘肃省财政厅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价值链干预视角下陕甘宁革命老区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西北地区经济转达型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14BJL094)。

放力度。”放眼西北地区的发展历史,从古丝绸之路到亚欧大陆桥,实现了跨越亚欧大陆、连结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便捷运输;从新亚欧大陆桥到丝绸之路经济带,跨越了交通成本约束的一维桎梏,更多地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血脉关系和空间价值。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古今之守:国家安全的价值发掘

回顾往昔,古丝绸之路的最初空间价值是以国家安全为价值导向的,当时主要是领土安全。比如,西汉时期,即使在汉武帝开通了丝绸之路之后,西汉王朝虽迎来了丝绸之路的一度繁华。但是,在贸易层面,朝贡贸易、边关互市、转贩贸易中,前两种仍主要是官方贸易,其经济属性是依附于国土安全价值的。而丝绸之路沿线的大宛国(今费尔干纳)、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各国,通过结盟,使领土安全满足之后,才达成贸易共识,丝绸之路的空间价值才转变到经济属性上。

环视当前,国家安全已涉及国民安全、经济安全、主权安全等多个领域。在国民安全层面,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和伊朗问题的先后浮现,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已对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合作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国土安全的重要力量。在国家经济安全层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明白: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一国金融危机往往会通过债务、股权、外汇市场的传导,迅速波及相关国家。面对这些危机,只有“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才有可能将危机带来的危害降到最小。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应有之意:经济发展的价值发掘

我们知道,技术是科学的具体化和实用化,是区域资源禀赋中最富有创新性和差异性的要素。技术进步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多源于不能很好地进行科技创新和机制变革。纵观人类经济发展,技术约束、空间拓展和行为选择刻画了人类基本的发展路径。在畜力为条件的中世纪之前,人类生活空间主要限定在大陆重心,“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余”,构成了人类主要的经济活动边界。在蒸汽与内燃机为技术支撑的近500年来,海域的拓展开创了国际贸易的新渠道,海权成为控制经济命脉的重要筹码。近些年,高铁技术的日臻成熟,为我们拓展新的经济空间提供了可能性。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中亚、欧洲等国打破海权控制的被动局面提供了可能,云南缅甸交通路线、中巴经济走廊的快速推进,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区域伙伴开拓马六甲海峡之外的物流和贸易路线孕育了新的发展空间。

毫无疑问,现代化新型陆路交通工具为地缘政治经济发掘新的空间价值提供了一种可能。丝绸之路经济带地理空间的开拓,给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新的市场。我们看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亚投行在内的新老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仅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就已达500多亿美元。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中国共享发展机遇,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取得重要进展。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运筹帷幄:资源基地的价值发掘

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兴衰,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然资源。从能源资源的储量和产量上讲,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的石油、天然气储量相当丰富,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和“21世纪能源新大陆”。人们还发现,在哈萨克斯坦有丰富的铍、镓等稀土储量,以及用于制造核弹头的铀和钚等物质。

如果我们以此作为比较优势,以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作为发展战略,却有可能使一些国家陷入资源诅咒。历史告诉我们,20世纪60年代,一些资源导向型国家(OPEC国家等)普遍开始面临经济减缓问题(中收入国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递增,而同期OPEC国家却下降了1.3%),而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已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出现了所谓的“资源诅咒”现象,它是指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长期依据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提供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虽短期获得了一定的收益,但长期看会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和生态环境恶化。^[4]然而,对此的分析多是基于市场假说,从私人产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为前提假设进行的研究。对于非再生性资源的开发,应基于资源供给的区域属性,从非均质假说角度去认识资源诅咒。可以通过减量再利用的生产方式,以及产业合作和资源禀赋战略重组两类经营方式,改变资源开发主导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通过空间价值的挖掘为资源诅咒问题提供一解。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百年大计:人文交流的价值发掘

从古至今,各种语言、习俗和思想在东西交互的熔炉里相互碰撞。“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这是国际事务中的至理名言。就我国而已,东北到西南的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沿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和冈底斯山,将早期的中国划分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期中,匈奴、柔然、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

游牧、半游牧民族相继代兴,汉民族与其交汇融合,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就东西方的交融而言,尽管宗教、文化、人文特征不同,但是对上天的敬畏,对大自然的崇拜是趋同的。

这一文化底蕴,建构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基本的议事规则。回顾三年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以来取得的成绩,我们看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建,尊重了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以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交流和沟通去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畅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未来,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唤起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记忆,释放合作潜能,方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百年大计。

(五)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千年之恋:生态高地的价值发掘

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共同梦想。审视当前,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教训是值得互学互鉴的。发展经济不能忽视环境污染,大自然已经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展望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项目多涉及资源能源领域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挑战,规避资源诅咒、环境污染等问题,需要我们多关注区域的生态价值,将资源成本与生态成本统筹考虑;需要我们共创新型合作模式、开拓多元合作平台、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二、基于区域方位的资源黏联性,瞄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构价值链治理路径

西北地区资源丰富,长期承担着国家资源基地的历史使命。但改革开放以来,却经历了资源诅咒的困惑(邵帅等,2013^[2];夏飞等,2014^[3])。一般而言,制度安排和区域效应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源诅咒的产生(Sachs和Warner,2010^[4]、2015^[5])。2015年国家首提供给侧改革,开始着力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在学术界,目前对供给侧改革的解释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基于萨伊定律,强调产能过剩的原因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人为压低了资金成本,扭曲了需求结构(许小年,2015)^[6]可以采取“八双、五并重”的思路对重点领域改革(贾康,2014)^[7]。第二类基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强调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所解决的需求不足问题,是一个短期问题,政策取向是采用货币刺激,而经济增长要取向于长远,从经济增长的要素入手(吴敬琏,2015)^[8]。第三类基于新结构主义分析,即经济体制应服从于发展战略的分析框架入手,提出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

侧的结构性改革(林毅夫,2016)^[9]。

可以看出,这些理论将有效需求和供给侧改革相结合,为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理论支持。在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在实体经济发展上,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同时,强调“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将这一系列理论和指导思想放置于西北地区自然资源的供给侧改革时,我们进一步发现,自然资源在现实中会表现出与区域相黏联的特性。即资源供给中,资源对区域的依赖性会使资源的供给产生一定的垄断特性,进而可以通过资源禀赋战略重置实现资源地区的经济新增长。比如,上世纪60年代,OPEC组织通过对石油资源价值链治理路径的战略重构,用地缘经济合作方式,形成了石油价格联盟,保证了其石油产业的可持续增长。可以想见,西北地区通过对优势资源价值链治理路径重构,将极有可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之所以形成这一认识的原因如下: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有利于摆脱既往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思维惯性

新古典经济学基于理性经济人和完全市场的假定,忽视了资源供给的区域黏联特性,进而用排他性和竞争性得出了资源供给的均衡价格。这一理论虽然突出了市场在资源定价中的作用,但同时也忽视了资源在供给上的区域黏联特征,没有将资源富集地区的区域发展和资源禀赋作为一个整体去系统考虑。而现有的区域发展理论,强调区位优势、强调交通成本。用这类研究成果去审视西北的区域发展,就会陷入“成本导向”的窠臼,割裂经济分析的“成本—收益”范式,陷入“富饶的贫困”是因为人力资源开发不足所造成藩篱(胡援成等,2007)^[10]。

(二)从历史方位理解西北地区的空间价值有助于发掘新的增长点

空间价值是指由区域资源禀赋结构特征所决定的附加价值。^[11]历史上,西北地区并非天然的欠发达地区,秦汉时期,“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①;到唐代,“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②。思虑其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体现的空间价值有所改变。西汉和唐朝早期,西北地区承担了国家安全的功能,主政者常用边疆的贸易换取国家的安全。但到唐中叶之后,府兵制的瓦解和藩镇割据,西北地区国家安全的空间价值并未得到很好地延续,致使经济中心南移。可以想见,西北地区战略能源和资源丰富,若能对空间价值进行进一步地发掘,重构价值

链治理路径,将有可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国家价值链治理的新视角有助于变资源诅咒为资源福音

解决此问题,需要将资源诅咒与资源潜在的未来自价值紧密联系起来,援引价值链治理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到1985年波特在《竞争优势》中提出的价值链概念。^[12]价值链的核心思想是企业通过采用业务单元或业务单元的联系,来实现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在这一过程中,价值链治理实际上就是价值链系统性的协调(Gereffi,1994)。^[13]在价值链治理路径上,Safran(1983)^[14]提出了资源禀赋的战略重置问题,并通过不同信息条件下的资源禀赋假定,数理分析得到了C-操控、W-操控、G-操控和D-操控四类策略。其中,资源禀赋战略重置意指资源禀赋的信息对产品价格构成影响之后,经济主体依据定价策略,对产品的价值创造和成本约束进行系统性地治理。这类战略性行为的例子有:奶牛场自毁部分牛奶以提高剩余牛奶的物价,石油公司对石油储备做出虚假报告以提高石油价格。并且,根据“波特假说”(波特,1995),在环境管制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方面,适当的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增加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也可以缓解供给侧的产能过剩。对此问题,保罗·克鲁格曼(2010)则更强调市场的方法去解决,提出在事前给污染物贴上价格标签更为有效;而对煤炭燃烧可以采取直接控制的方法,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我国目前在价值链治理上,主要偏向于国家价值链重构下的产业升级问题,其主要观点是中国在“被俘获”的全球价值链下,弱化了中国发展的主动性(刘志彪,2011)。^[15]然而治理路径的探索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裨益。如,强调要基于一国内的产业合作而言,通过知识、技术等高位资源要素构建国家知识分工体系(詹浩勇等,2015)。^[16]再如,对于资源产业的价值链治理,产能过剩与环境治理的政策路径是一致的(杨振兵等,2015)。^[17]再如,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对高污染的企业征收高额环境税(韩国高等,2011等)。^[18]

三、基于区域方位的环境差异性 瞄准国家创新驱动战略 强化中小企业创新支持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然而,由于西北地区“三线”建设时期重化工业的嵌入,导致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布局呈现出大企业过大,小企业过小,集聚效应不强的局面。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一)西北地区技术环境的差异对企业绩效的

影响及表征

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往往强调“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线路。比如,Schroeder,Bates和Junttila(2002)^[19]在研究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等五个发达国家的电子、机械和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企业绩效时;以及Yeoh和Roth(1999)^[20]在研究美国处方药制药企业时,都采取了这一研究路线。但是,Kumard等(1999)^[21]对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企业调查后发现,企业研发技术的吸收能力、技术的实用性、技术转让渠道、政府投资、企业文化等对企业绩效都有一定的影响。而Giaoutzi(1985)^[22]以希腊企业为样本研究表明,技术转移的渠道和技术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影响较大。

这些研究启示我们,研究西北地区企业的研发能力,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我们应该采取“技术环境—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竞争优势”的思路进行分析。十九大报告强调企业技术创新的转化性,无形中也是从技术环境角度去认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样一来,企业创新也就成为了与市场需求、技术供给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也必然要求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应给予更多的项目支持、资金支持和人才支持。

(二)产业层面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注重技术环境和技术政策的优化配置

以市场吸纳为导向,做大做强科技创新、企业孵化、融资服务等发展平台,促进创新与资本的有机结合,引导企业积极开展新兴产业和优势产品的研究。要注重发挥人才优势,积极对接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技术转换,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要通过减免相关税收或增发补贴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资金收益率,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上的突破。

(三)企业层面着重做好企业技术战略的实施和企业技术能力的内生性

技术战略有助于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在技术选择的定位上,要根据当地资源禀赋结构,选择由需求拉动的技术创新,这样企业风险相对较低,同时收益又相对较高;在技术创新路径上,要注重人财物三者的有机结合,确定合理的薪酬制度;在技术战略的选择上,应采用跟随创新战略和模仿创新战略,有针对性的对专门客户进行技术改进。在企业技术能力的内生性方面,对于技术能力的获取,可侧重于对引入技术的简单模仿和应用,然后在逐渐领悟中掌握;对于技术能力的吸收,可基于“用中学”的认识,强化技术技巧性、情景限定性和个体体验性的认识。对于企业技术能力的使用,强调学会生产(使用设备)和学会效率性和创新性生

产(现场管理)使员工在隐性知识共享之后,产生内生效应。

四、基于区域方位的制度连续性 瞄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提高农民发展能力

土地所有权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这赓续着改革的初心,任重而道远。

一般而言,土地改革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结构主义思路,前苏联就采用了此方法。它强调土地国有,锁定农村人口就业渠道,阻止大规模人口向城市迁移,以粮食供给稳定国家机器的运行。另一种是新古典主义思想,欧美国家普遍采用此方法,强调以土地产权的自由化交易,实现土地经济效率的显著提升。不过,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土地制度上,走了一条中间道路。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中,把土地改革看成了社会结构的变革,这秉承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土地问题的认识,主张社会主义应该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不是所有权本身。1978年之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的实施,一方面吸取了结构主义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借鉴了古典主义的自由经营。即,我们既秉承了土地所有权问题的不可逾越,一定程度上,也兼顾了古典主义的效率优先原则。

需要指出,坚持土地所有权公有,是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借鉴历代兴衰原因而获得的制胜法宝。就“兴”而言,夏周及王莽时期的王田制,强调土地的国君所有,但忽视了天下苍生的利益,西晋时期的占田制,确认了士族门阀占有大量土地的既成事实,却将国家力量推向了积贫积弱的边缘,曹魏、元、明、清时期的屯田制,保证了军需和戍边,但百姓的福祉没有得到很好地激励,北魏和隋唐时期的均田制,分发荒废土地给农民,较好地激发了农户的耕种积极性,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营造了国家能力异常强大的盛唐。可见,隋唐的土地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可圈可点的鲜活样本。就“衰”而言,如,唐玄宗中后期,废除均田制,允许土地买卖,长期恶性演变,土地高度集中,亦同其他朝代一样,滋生了大量流民,国家陷入动荡。从中管窥,土地所有权的稳定和合理,是以防范流民、归旨国家安定统一为基础的。

及至近年,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试点的天津的宅基地换房模式、成都的拆院并院模式、重庆的地票模式、深圳的集体

工业用地流转模式、沙县的土地流转信托模式,以及2016年4月出台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都重在土地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而不是所有权的变更。这一思路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

毫无疑问,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的协调机制,来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土地增值的收益,是抓住了当下问题的命门。但是,从长久来看,城镇化的推进,必然会引起生产、生活和生存环境及方式的深刻变化。单就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言,进城务工、新农村项目的推进会相对容易适应这一转变;然而,就生存方式而言,它是人们扩展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推进改革的初心,它包括避免饥饿、选择生存方式、享有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和防护性保障。说到底,需要我们解决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表现出的适应能力不足、社会身份的边缘性,以及拥有的机会和资源匮乏等问题。

具体而言,在21世纪之初,一部分征地农民在得到约2、3万元左右的征地补偿后,其发展能力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致使这些农户近些年想通过上访来获取新的补偿。究其原因,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征地农民主动适应社会的能动性不够;其二,是社会环境桎梏了征地农民的权益表达所造成。为什么会与社会环境有关呢?这是因为,就正式制度而言,针对征地农民的同工同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就非正式制度而言,大众的习俗文化和个人惯性,会使得他们在对待征地农民时,产生一个选择性很强的网筛,用自己的主张和取向对征地农民产生规避性选择。

为此,国家面临的选择应该是,用外在制度的完善,推动农户自身能力的提升。首先,在权利问题的表达上,要保持利益诉求渠道的畅通,上访事件、群体事件才会明显减少。其次,在权利问题的实现上,要注重用法律保障征地农民的权益,注重他们的物质补助和精神关怀,尤其是不能忽视教育条件、医疗卫生条件和社会保障等配套的公共服务。再次,要充分考量征地农民社会公正感和幸福感,不误解、不妨碍、不消极看待失地农民所处的生活际遇,从舆论上支持其寻求幸福生活的努力,使其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最后,应该有组织地帮助他们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新去建构适合新的生存环境的心理状态。

五、基于区域方位的空间有界性 瞄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大力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

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众所周知,西北是中国生态的重要屏障,西北生态要是出了问题,将会直接导致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恶化。就甘肃而言,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交会处,是黄河、长江上游的重要水源补给区,是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生态安全战略和发展稳定大局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甘肃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干旱和半干旱面积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5%,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和盐碱化严重,生态保护和治理任务异常艰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立足西北生态环境脆弱的特征,我们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注重考量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性,强化经济增长对生态保护的带动和转化作用。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改进。持续推进土壤综合治理,强化天然林、湿地和绿洲的保护和恢复。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湖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有序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强化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

注释:

- ①见司马迁《史记》第129章。
- ②见司马光《资治通鉴》216卷。

参考文献:

[1]Auty R.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C].European Conference on Lasers and Electro-Optics [A].2007 and the International Quantum Electronics Conference.Cleoe-Iqec.IEEE ,1993:1-1.

[2]邵帅,范美婷,杨莉莉.资源产业依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效率?——有条件资源诅咒假说的检验及解释[J].管理世界,2013(2):32-63.

[3]夏飞,曹鑫,赵锋.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西部地区“资源诅咒”现象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4,(9):127-135.

[4]Sachs B J D,Warner A.M.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J].2010.

[5]Sachs B J D,Warner A.M.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 no.5398[J].2015.

[6]许小年.高层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J].新经济,2016(1).

[7]贾康,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学理启示及立足于中国的研讨展望[J].财政研究,2014(8):2-16.

[8]吴敬琏.靠投资拉动不可取[J].资本市场,2015,(4):8-8.

[9]林毅夫.供给侧改革,彰显我国制度优越性[J].政策,2017(3):15-15.

[10]胡援成,肖德勇.经济发展门槛与自然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4):15-23.

[11]闫磊.伺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西部:资源诅咒之惑与空间价值一解[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27-138.

[12]PorterME.TheCompetitiveAdvantage[M].New York:FreePress,1985.

[13]GereffiG,KorzeniewiczM.Commoditychainsand-glob-alcapitalism[M].London:Prager,1994.

[14]Manipulation by reallocating initial endowments[J].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2006,12(1):1-17.

[15]刘志彪.重构国家价值链,转变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思考[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4):1-14.

[16]詹浩勇,冯金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国家价值链与西部地区产业升级[J].学术论坛,2015(5):36-40.

[17]杨振兵,张诚.产能过剩与环境治理双赢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生产侧与消费侧的产能利用率分解[J].当代经济科学,2015(6).

[18]韩国高,高铁梅,王立国,齐鹰飞,王晓妹.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波动及成因研究[J].2011,(12):18-30.

[19]Schroeder R.G.,Bates K.A. and Junttila M.A. 2002.A resource-based view of Manufacturing strategy and the relationship to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2):105-117.

[20]Yeoh P.and Roth K.1999.An empirieal analysis of sustained advantage in the U.S.Pharmaceutical industry:Impact of firm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7):637-653.

[21]Vinod Kumar,Uma Kumar& Aditha Persaud. 1999.Building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Through Importing Technology:The Case of Indones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4:81-96.

[22]Maria Giaoutzi.1985.Factors affecting the capacit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case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vol.58,73-82.

(编辑 部娜)

Liu Qijun Zhao Xiaoyan

(School of Economics, North Minzu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Abstract :The main reasons of long-term poverty for a family in ethnic region lies in the heavy payment of education, medical treatment and marriage, which surpasses serious the poor family's normal income, it also affects the lack of an effective social assistance to the poor family and as a result becomes the main factors of long-term poverty, so serious it is in Ningxia, we take Ningxia as a case and have a systematical analysis on the status of poverty and the poor reasons, then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so as to provide the possi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building the social assistance in ethnic region.

Key words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Ethnic region; Expenditure poverty

(10)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e Scale in the Five Provinces of Northwest China in Perspective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Liu Jiang Hou Xue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101)

Abstract :Agricultural moderate scale operation can promote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It is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 that leads the agricultur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e. The agriculture of the five provinces in northwest China is typical of the dry land area agriculture. It's very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northwest upland area to study the agricultural scale efficiency of the five provinces.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6 to 2015, DEA-BCC and dynamic Malmquist model to measure the five northwest provinces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efficiency, I foun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the five northwest provinces is poor mainly caused by poor scale efficiency; Using the Tobit panel data model to analysis the effect, I found the agricultural film, diesel, total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ower, financial funds for supporting agriculture, d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crop play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role on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scale; The rate of fertilizer, pesticide and disaster rate of sowing area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scale; The labor quality, agricultural technical personal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area of the family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scale.

Key word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Efficiency; DEA model; Panel Tobit regression model

(11)

Regional Orientation of Northwest China Transition In The New Era

Wang Haiyan Liu Yushun Yan Lei

(Gansu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Lanzhou 730010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Judgment on the New Era and Major Contradictions in the reports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of the regional orientation aiming at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exploring the new spatial value of the region can help to solve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problem; based on regional the resource orientation aims at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reconstruct the value chain governance path, help to change the curse of resources for the Gospel of resources; based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orientation, aimed at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strengthening SME innovation support, help to provide an inexhaustible driving force for transformation leap; based on the region Orientation of institutional continuity, aimed at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will help improve the ability of farmers to develop; based on the spatial orientation of regional orientation, aimed at the refor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vigorously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

Key words :New era; Main contradictio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1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in Internet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Deng Xiaobing Liu Xiaosi

(School of Law,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virtuality, anonymity, openness, globality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yberspace have led to total chaos of the network world, and the society has a growing demand 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The traditional legal and technical means have their own limitations while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has advantages which do not exist in the other mean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using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status quo of network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subject, measures, object, soci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in network governance in both countries so as to obtain the reference and thinking for Internet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Internet governance;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Government regulation; Content rating